

何一民 著

中国城市史纲

ZHONGGUO
CHENGSHI SHIGANG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何一民 著

中国城市史纲

ZHONGGUO

CHENGSHI SHIGANG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014号

责任编辑:陈丽莉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罗庆华

中国城市史纲

何一民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红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本 12.875印张 2插图 300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册

ISBN 7-5614-1085-9/K·113 定价:8.50元

序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神奇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因此，研究城市，理所当然是研究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重点课题，是探究历史奥秘与当代问题的一个窗口、一把钥匙。

在20世纪初，世界上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了90年代，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42%，即全世界约有21亿人居住在城市里。这种城市化现象呈增长之势，估计到21世纪，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城市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和创造基地的地位将更为显露。城市问题将愈多，城市与人们生存与发展关系将愈密切。因此，国际上对城市的研究也愈益重视，一门新兴学科——城市学在世界范围内已蔚然兴起。城市学的一个分支——城市史学，作为城市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应运而生了。

城市史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末本世纪之交，首先在城市化发育充分的美国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地区有了进一步发展。到60—70年代，国外城市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统计，国外有关城市史的著作，60年代按年度平均计算突破了500种，70年代中期为1000种，1982年已达到1400种。中国城市也日益受到各国城市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古代城市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所罕见的。在我国史学的宝库中也不乏有关城市的记载，蕴藏着丰

富的城市史资料。有《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长安志》、《历代帝王室亲记》、《宋东京考》等专门以城市为内容的史籍,还有《三言二拍》、《老残游记》、《红楼梦》以及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蜀都赋》等著名作品,对历代京都与通都大邑做了很有史料价值的描述。但是,我国古代没有出现独立的城市学、城市史学。

到了近代,外国人写过一些关于上海、汉口等城市的论著。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现过上海史研究的高潮,梁启超也写过都会历史的专论。但严格的说,并没有形成城市史专著。就上海而言,近世以来,除了若干论文而外,专史则有英国人写的上海史,法国人写的上海史,日本人写的上海史,但这些研究实则为今公共租界史或法租界史,有的侧重于地理历史,或只及于社会现象,而无完整的上海史,更无中国人写的上海史。一些文史游记类作品,如《上海指南》、《天津指南》、《武汉指南》、《成都导游》、《拉萨见闻》、《重庆风光》、《雄伟的南京》等作品,其主旨和内容与城市史学科的构建距离甚大。因此,在近代中国亦无独立的城市学、城市史学。解放以后三十多年,出于各种原因,这一领域亦为研究视野所不及。这不能不是我国经济、学术发展滞后的表征。

近十年来,由于我国史界思想解放,学术的改革与发展要求,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呼唤,城市史才从我国源远流长的史学母体中分娩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城市有了很大发展。1990年全国已有467个城市,近十年来,我国城市化速度远较世界平均速度为快。世界年平均增长约0.36%,我国1980年至1989年平均增长率为0.58%,1990年则达0.7%,美国区兹堡大学谢觉民教授估计,到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增加到3.1亿至3.4亿,“这真是世间少有,也越显得问题的重大。”1982年国家提出了“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的流通,逐步形成

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这样，如何从历史深度把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功能的演变，文明的进化，并进而到考察当今城市的状况、布局和发展，规划和预测城市发展的走向和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道路，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城市管理学诸学科结合、交叉的新学科——城市史学就成了社会与学术发展的必需与必然了。国家经济建设大潮与史学界改革要求相结合，驱动了我国城市史的构建。有关中国城市起源的考古研究，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以及个体和地区的城镇研究不断推出了新的成果。尤其是在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将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纳入国家项目，并将沪、津、汉、渝四个城市列为首批课题，从而开辟了新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城市史的新局面。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又将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东南沿海城市研究，华北沿海城市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城市学等列为重点课题，强化了我国城市史学的构建工作，引导出了一批有关城市史研究的专著、论文，初步构建起了中国的城市史学科。

由于我国城市史学出现时间不长，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方法上，或是在队伍建设上都是任重道远，需要学者们去反复探索。就目前展示的成果而言，个体城市研究成果较多，区域乃至全国性的成果较少；专题研究的成果较多，整体研究的成果较少；中国城镇研究的成果较多，中外城镇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少。而缺少一部具有通史性、基础性的中国城市史，更是急需补上的一个空白。

何一民副教授是四川大学的一位年轻史学家，现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科研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和“八五”期间重点科研课题《近代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致力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已逾十年，成绩显著。为适应城市史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旁征

博引,奋力笔耕,写出了《中国城市史纲》一书,8章20节30万字,将先秦迄1949年的中国城市发展脉络加以系统梳理,分期描绘,并就各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抒发心得,详今略古,推陈出新,成为一本具有通史性的中国城市史专著,既填补了目前我国城市史研究的空白,又提出了若干深入研究城市史的意向,是很有学术参考价值的。

城市是历史的。当代的中国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尤其是近代中国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历史上城市发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和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至今。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城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古知今,了解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应该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一门必修的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城市史纲》一书是以改革精神,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寻找历史学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一种可贵的尝试,是很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事物由不成熟到成熟必经一个发展的过程,学术研究亦复如此。《中国城市史纲》还只是一本探路之作。作者踏着前人的足迹走出了新的脚步。创始固然可贵,慎终尤其困难。我希望本书作者自强不息,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在学术上攀登新的高峰。我希望专家和读者们对年轻学者的新鲜成果能细细品尝,倍加关怀,多多赐教,促使优秀人材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我国史学的未来,唯有依靠后起之秀者,后起之强者。

隗瀛涛

1994年5月于四川大学

自序

城市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以历史上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及规律为目的的历史学科的分支。城市史学在中国的兴起较晚,大约在本世纪80年代初。著者从事于城市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从参加博士导师隗瀛涛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开始的。其时很希望能找到一本关于中国城市通史性的著作学习参考,也许是孤陋寡闻,也许是地处偏僻,始终未能如愿以偿,留下深深的遗憾。在教学过程中,不少学生也提出类似的问题。这成为我写本书的动力。1989年,我曾与谢放学兄一同讨论过写作提纲,并决定由我们合作撰写。遗憾的是,谢放学兄由于工作较忙,另有重任,终未能如愿参加本书的写作工作。中国城市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当著者独自一人撰写本书时,方感困难重重,力不从心,实难荣任此重任;再加上不断而来的繁重教学任务和其他的研究任务,使著者深感压力沉重。在“七五”规划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完成后,我又参加了国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经课题组负责人隗瀛涛教授的提议,本书的写作纳入到以上课题之中,从而使我又获得新的动力。

几经疲惫,几度寒暑,数改提纲,数易其稿,方始成此书。著者自知才疏学浅,谬误和遗漏在所难免。由于众所周知的出版困难等原因,著者在写作时,不得不割爱,对各章节都尽量压缩,以致若干问题都未能展开深入探究,但我相信时代的发展必将呼唤出一部甚至若干部可以充分展示中国城市发展全貌的著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魏瀛涛教授的帮助与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又欣然为之作序。在出版过程中,四川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锦厚教授、责任编辑陈丽莉女士和社长助理陈建明副编审等人给予真诚的支持。我的妻子田亚莎在整个过程中给我以极大的支持与鼓励。此外,还有许多同仁和朋友都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关心和支持。著者谨向他们致以深挚的敬意和谢意。

本书写作过程中,著者参阅了若干前辈和同仁的著作、论文,书中未能一一注明,谨此表示歉意和真诚的感谢。本书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概由著者自负。敬请读者予以赐教。

著 者

1994. 3. 于成都

导 论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在人类刚摆脱蒙昧,文明的曙光初照天际的时候,城市就开始出现。随着文明的发展,城市成为文明的载体和温床。城市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文明积累、整合和传承的过程。人类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是在城市里产生,城市集中了主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几乎包罗了人类生活的各种内容。

20 世纪以来,城市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城市化和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城市问题层出不穷,城市结构和城市功能的变化,给城市居民带来种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人们不得不对城市进行严肃的思考,如何发展城市已成为一个亟待选择的问题,各种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也随之而兴起。但是,“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的任务。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循这些遗迹继续追寻,沿着城市经历的种种曲折和所留下的印痕,通考有5000 年文明可考的历史,直到今天正在展现的未来。”^①

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距今约5000 年前左右开始出现早期城市。在这漫长的历史程中,中国城市多次出现辉煌发展,并有其自身的特点。从原始社会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第1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年出版。

一 城市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一时期,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战国,为城市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

从原始社会末到商周时期是中国城市初步形成的时期,目前发掘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看,此一时期的城市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政治、军事因素成为城市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原始社会中前期,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过着流动的、分散的生活,因此不可能产生城市。到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阶级分化的出现,开始出现人口的空间聚集趋势。但充分的空间聚集——形成城市只能在经济较发达、剩余的自由资源可获得程度提高、阶级充分分化的奴隶社会才会出现。早期城市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经济力量来聚集人口,从而形成城市;一种是以政治、军事实体为基础,以法律的、宗教的、行政的或暴力的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人口的聚集。中国城市的产生大都是后一种类型。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先秦时期大批城市的出现不是依靠小村落等居民聚集点逐渐发展而来,而是各国统治者 of 建立政治中心、军事据点,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来修城筑郭、聚集人口。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两次筑城高潮的出现,都与当时各国的统治者 of 巩固政权、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对民众的统治,以及进行战争关系密切,即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早期城市是以等级制、世袭制为特点,以王室、贵族、军队为城市社会的骨干,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处于从属地位,是为第一类人服务的,都城成为区域的中心。而都城中则以宫殿以及祭祀性、宗教性的建

筑为中心。这种特性为以后历代城市继承,从而形成了中国城市的一个特点。

2. 形成严格的城邑等级制度。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为了有效地控制诸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即是建立城邑等级制,规定城市的大小,严格按等级修建:周王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五里,男三里。此外,对城墙的高度道路的宽度、重要建筑的规模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否则就是“僭越”,将受到严厉的制裁。按照分封制的规定,诸侯在自己的封区内也实行分封,即将大部分封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也按等级在封地内建邑,从而形成了城邑等级制度和全国性的城邑等级网络结构。由于实行城邑等级制度的结果,周代的城市除少数以外,规模都较小,功能简单。

3. 宫殿建筑及其他政治机构建筑成为城市的主体,城市规划受政治的影响很大。

由于城市主要是因政治原因而建的,因此城市中设置了大批的政治机构。如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大型的宫殿建筑群,仅宫殿台基就达一万余平方米,此外还有不少的其他政治性机构遗址。郑州商城、安阳殷墟、西周镐京、东都等都是宫殿及政治性建筑为主。城市结构和城市规划也受到政治的影响,周代的城市按照奴隶制的等级尊卑制度和宗法礼教思想,对各级城市的面积大小、道路配置,以及城市中行政、经济功能分区,均有严格的规划,《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另外对城市的规模也有严格的规定规划。

4. 城市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有较大的发展。

从现已发掘的这一时期的城市遗址看,商周时期的城市建筑技术已较高,主要表现在:(1)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由单体建筑发展成为自成院落的大型建筑构成建筑群。(2)四合院式建筑的出

现,在技术上解决了四合院四面屋顶转角相交处的里转角等复杂的结构问题;木构建筑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3)瓦的发明和使用,不仅解决了屋顶的防水问题,也延长了房屋的使用期,并使房屋建筑的简陋外形得到改观,从而对城市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瓦的发明和使用,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另外夯土技术趋于成熟,从而为大规模的筑城准备了条件。

5. 重要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地区。

此一时期的重要城市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如偃师商城在河南洛水北岸,垣曲商城在山西,郑州商城在河南,安阳殷墟在河南,西周丰、镐、成周等也都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城市,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等,但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城市发展的主流仍在黄河流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封建的生产关系萌芽并得到发展。为了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各国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改革,从而促进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变化,封建的社会制度逐渐确立。社会的巨变也给城市发展带来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大批封建城市兴起,城市规模扩大。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一批封建城市兴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筑城高潮,各国都把筑城做为一项立国的基本国策,不惜人力物力来修城筑池,仅《春秋左传》记载的筑城活动就有68次之多,除5次是重修外,共筑城63座。战国时期关于筑城记载更多,据不完全统计,其时各国的大小城市已达千余。如赵国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燕伐齐,“下齐七十余城”;秦攻魏,“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当然不否认其中有一些城只是军事城堡,功能单一,还不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但有相当的资料可以证明其中已有相当部分已发展成为封建城市。此一时期的城市不仅数量

增多,而且规模也有所扩大。由于周王朝的衰落和灭亡,周王朝所制定的限制诸侯发展的城邑等级制也被打破,因此,诸侯的城市普遍超过了“三里之城,五里之廓”的规模,大中城市数量增加。《战国策·赵策》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邑之家相望也。”战国时期著名的城市有:临淄(齐国)、蓟(燕国)、涿(燕国)、荥阳(韩国)、温(魏国)、枹(魏国)、郢(楚国)、邯郸(赵国)、咸阳(秦国)、阳翟(郑国)、三川(周国)等。其中临淄周长12公里,有人口达7万余户,据《史记》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如果以每户5人计算,则有35万人之多,其规模之大是过去的城市无法相比的。秦都雍城东西长3300米,南北长3200米;邯郸西城面积为 400×1400 米,东城面积为 1400×700 米;燕下都周长8公里,其时城市的面积普遍超过商周时期。同时城市的分布较过去更广泛,除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的城市较多外,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甘肃等地区也出现了数量不等的城市,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城市约占城市总数的1/4。但总的说来,北方城市发展较快,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初步奠定了北方城市的发展格局。

2. 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春秋早期以前的城市大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居住地,除少数城市规模较大以外,其他城市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士、农、工、商及奴隶大都居住在城外,城市社会结构比较单一。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宫廷人员、官僚贵族、军队,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种人员数量相当庞大,占城市人口比例仍高。但随着城市人口增多,封建制度的逐渐确立,工商业者获得较多的自由,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减弱,生产积极性也有所提高。因此城市中除了统治者外,士、农、工、商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特别是士阶层的兴起和私营工商业者的增多,使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士是一个特殊阶层,春秋以前即已存在,曾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春秋战国时期,士由于有相当

的自由,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文化,通晓“六艺”,成为介于专事统治的贵族和专事生产的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因而适应了社会大变革的需要,人数不断增加。士的职业种类很多,其名目有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游学之士、法律之士、侠士、庶士等。各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对士的需求增加,大兴养士之风,“诸侯卿相,皆争养士。”从而也推动了士阶层的发展,士成为城市社会中一股重要社会力量,和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从事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并出现了一批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者。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内部的分工更细,如雇工有庸徒、庸民、庸客、庸保、凭庸、凭市庸等。如果从行业来看,则划分为木工、石工、玉人、铸工、纺织工、漆工等。商人中有官商、私商、行商、坐商、大商小贩等。个体工商业者大量增加,他们往往聚族而居,手艺家传,分工协作,集中经营,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居民之一。随着服务业和娱乐业的兴起,卜者、医者、日者、修鞋补席者、厨子、屠夫、乐人、倡优、妓女等也在城市中出现,这样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士和工商业者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

3. 城市向多功能发展。

商周时期的城市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宗教中心。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城市。如齐都临淄成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史称“临淄甚富而盛,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近年在临淄故城遗址发现大小两城,大城中散布着一般居民住宅和冶铁、冶铜、制骨等作坊遗址。赵国都城邯郸也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冶铁中心,其他如燕下都、蓟、咸阳、成都等城市的工商业都空前的繁荣,城市成为地区性的经济中心。中国城市的性质和类型发生变化。但需指出的是城市虽然具备了经济功能,却没有形成单纯的工商业城市,政治功能仍然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城市和经

济的发展仍然置于集权政治的监控之下。这一特点对以后几千年间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这一时期城市文化也出现空前的繁荣,为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彼此激荡,出现了思想领域内“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教育、科技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城市成为文化的中心。不少城市向以政治功能为主的综合性多功能的中心城市发展。

此一时期城市虽然有较大发展,但是不能估计过高,除个别都城发展显著外,一般的城市发展水平仍不高。

二 古典城市的发展

第二时期,从秦代到清代中期(鸦片战争前),为古典城市发展时期,此一时期,城市随着王朝的兴衰呈波浪曲线发展,并趋向成熟,其发展特点为:

1. 形成严格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制度虽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城市仍继承了先秦城市的特性,成为中央、郡、县各级政权机构所在地,从而逐渐形成首都——郡治——县治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宋以后此一体系更趋完善,发展成为首都——省会——府(州)——县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城市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行政隶属关系。即使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时,这种城市体系也仍然存在,只是由大一统的城市体系分为若干小的城市体系。如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虽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但是各国都有自己的都城,并以此中心,形成独立的行政城市体系。

由于城市大都是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兴建的,城市规模的大小是同城市的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每个朝代最大的

城市都是都城,其次是省城、府州城,县城的规模最小。都城是统治者重点建设的城市,每一个王朝都不惜财力、物力、人力来建设都城。中国的都城不象许多国家那样长时期固定在某一城市,而是常有所变化。导致迁都的原因较多,如地缘政治、军事防御、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等都成为迁都的重要原因;另外,新王朝建立后,为免于前朝的不吉利影响,或要摆脱传统势力的包围也成为迁都的重要理由。另外前朝都城被严重破坏,新王朝无修复旧都的经济实力,只好迁都的情况也常有。因此,古代中国的都城相当多,这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县级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的主体,县城规模一般都不大,但却是历代王朝的重要统治据点。县城大都是四方形,有城有郭,城门、城楼、城墙成为封建王朝权力的象征。从单体城市来看,县城的兴衰变化较大,但是从总体上看,县城的数量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据统计,历代县城的数量为:汉代1138个、隋代1255个、唐代1557个、宋代1234个、元代1127个、明代1138个、清代1353个。唐的县城最多,其后则逐渐减少,到清代才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县城的作用下降、衰落,其实正好相反,唐以后县城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并不断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延伸,成为统治者控制和拓展其疆域的一个重要行政手段,也是中央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县城成为联接农村、集镇和大中城市的交叉点。

2. 城市无自治权和无法定的独立地位。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一个重要区别。欧洲中世纪城市是在封建社会的阶级对抗中成长起来的,许多城市通过武装斗争或赎买等方式,获取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治,不少城市建立了城市议会,通过选举产生城市管理者,市民的权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封建主无权直接管理,城市居民较为自由。从形式上看,城市社会是封建秩序的一部分,但其内部结构偏离正轨,为封建社会秩序的衰落创造和贮存了潜在的能量。与之相反中国